

〔西班牙〕巴尔塔沙·格拉西安◎著 肖聿◎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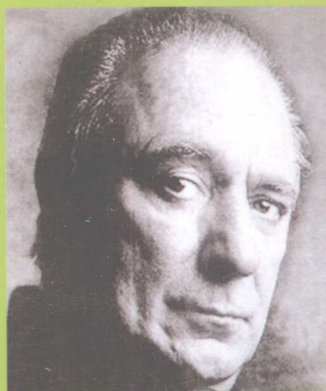
世俗生活的智慧

THE ART OF WORLDLY WISDOM

既有睿智的世俗，又有世俗的睿智，
是修养之书中不可多得的精品。

人生在世，风云莫测，激烈的竞争，感情的困扰，亲朋的离合，
疾病的折磨……

撷取警句的智慧之花，用警句筑起一道心理屏障慰藉心灵从容
走过一生。

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THE ART OF
| WORLDLY WISDOM
世俗生活的智慧



〔西班牙〕巴尔塔沙·格拉西安◎著 肖聿◎译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俗生活的智慧 / (西) 格拉西安著; 肖聿译. —北京:
中国商业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-7-5044-5926-8

I. 世… II. ①格…②肖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0475 号

责任编辑 孙启泰

*

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
(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 1 号)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9 × 1194 毫米 32 开 7.25 印张 162 千字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 18.00 元

* * * *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)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文版译者前言

一、世俗智慧与警句

《世俗生活的智慧》(Oraculo manualy arte de prudentia), 西班牙修士巴尔塔沙·格拉西安(1601-1658)发表于1647年。正因写了这三百条警句, 格拉西安被今人誉为处世大师, 亦可唤作“世故儿”, 一如国人送给美国人达尔·卡耐基¹的诨号, 或按北京俗话, 叫“社会油子”。更有人说, 格拉西安集了人生教练、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家和尤达²于一身。西谚有云: “诗人如猪, 惟死后方为人所爱。”此话对格拉西安也适用。生时藏藏匿匿, 还被缄了口, 三百多年后名震寰宇, 不知算不算善果。

此书定会引起我国读者对格言警句文学的兴趣。世界各民族的谚语、格言和警句因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, 早已自立门户, 成了文学的一种体裁。《世俗生活的智慧》的英译者雅各布斯认为: 格言与警句不同: 格言表达的是对人和人生的见解, 警句是告诫人们如何应付生活中的各种紧急事件: “格言描述人类本性的某个事实, 警句则向人们提出某种行为方针。格言的语气是陈述性的, 警句的语气则是祈使性的。”他还认为谚语也是警句, 两者的区别在于谚语查无作

1 达尔·卡耐基(Dale Carnegie, 1888-1955): 美国教育家, 因其处世术著作《怎样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》(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, 1936)而闻名。

2 尤达(Yoda): 美国影片《星球大战》里的智者、绝地大师、绝地武士的师傅, 九百岁。

者，而警句往往能溯及作者。这不但是行家之言，而且丰富了处世智慧文学的研究内容。

塞万提斯说：“谚语就是用一句短话表达长期的经验。”警句既是有作者可稽的谚语，自然也具备这个特点。警句是浓缩的智慧，用最少的话表达最丰富的思想，符合经济学的效率原则。但也有人认为：较之格言，警句的短处在于它往往不只是一句短话。警句缺乏格言的概括力，往往就事论事，虽未写具体事件，却是个人的经验或看法。此话也有些道理，例如“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，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”之说，其作者能将它写出，十有八九是个人体验使然，恐为现身说法。它被收入了《古乐府》，乐府者，民歌也，可见曾被传唱。又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中的“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，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，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”，也像是少女经验之谈，堪称古老的警句歌谣。

世俗智慧（**worldly wisdom**，也有译作“人情世故”的）是格言警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本质上，世俗智慧体现了人们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。其内容也包罗万象，总结成功，归纳教训，洞察人性，评点世事，抒管见，发牢骚，愤世，自励，不一而足。为君王谋，讲的是霸术，权术，笼络术，镇压术；为自己谋，讲的是忍术，骗术，攀附术，全身术。这些道术是古往今来的社会潜规则，大多能做不能说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更不便写进教科书。

正因如此，世俗智慧，处世术，世故经验，才被一些人看作了边缘文化甚至另类文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世俗智慧是为弱者的文化。这种智慧里的豪言壮语，像是阔佬误闯了贫民窟；这种智慧里的劝善励志，如同追悼会上的红衣服。其中更常见的，倒是避祸与隐忍，是痛定思痛，是事后嗟叹。试看几例：

《左传·桓公十年》中说：虞国国君得知虞叔有宝玉，问他要。虞叔先是不舍，后来审慎帮了忙，使他想到了周朝的谚语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，倏尔大悟，“我岂配用这东西，这简直是招灾啊！”（“吾焉用此，其以贾害也”）终于忍痛割爱，献璧于王。这是告诫弱勢者：有宝切莫让国君知道；若藏不住，还是主动献给人家为上。须知据“成王败寇”之理，国君是成功的寇，且是坐寇，不是流寇。后来，晋人张华将这段经验总结成了警句：“不怀宝以贾害，不饰表以招累”（《鸛鵲賦》）。此为弱者哲学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中说“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如鲁迅所言：“古圣人所教的‘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’，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，是应该坚壁清野的。”（《坟·坚壁清野主义》）那个四岁就知道“让梨”的大儒孔融全家被曹操杀头以前，其儿子们的体会是“覆巢无完卵”。大奸臣秦桧一死，其走狗曹咏得到了一篇辞赋，标题为“树倒猢猻散”。

古代西班牙有民谚说：“去见卡尔西亚的法官，要手中有脚”（A juezes Gallicianos, con los pies en las manos）。原来，那个城的法官是吃贿赂的，因此你若想胜诉，先得提着家禽去孝敬法官。以手倒提鸡鸭鹅，是为“手中有脚”。我国的民谚也说：“穷死不偷钱，冤死不告状。”这些说法都是弱者哲学。

《史记》里的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这句格言，出自辅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的大夫范蠡之口。他自己功成身退，带着西施去经商，成了富翁陶朱公，而不纳此言的文种大夫果真落了个被勾践赐剑自杀的下场。这格言是弱者以鲜血写给后人的。

沧海桑田，世情万变，但无论人类的境况如何演变，世俗智慧的原理都没有多少变化，相似的情境都会反复发生。

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如《圣经》所言：日光之下无新事^①。无论古今中外，谚语、格言和警句都是民俗之镜鉴，语言之作料，世情之折射，人性之写照。它们普遍适用，堪称无所不包。正因如此，各民族才产生了相似的谚语警句，遂使各种语言的谚语警句得以互译、借鉴和交流。做些比较，颇为有趣：

我们的谚语说：“酒醉吐真言”；古罗马人说：“*In vino veritas*”（酒中有真）；英国人说：“*Wine wears no breeches*”（酒不穿裤子）。

我们的谚语“请君入瓮”，说的是唐朝的周兴发明了炭火大瓮的酷刑，第一个被弄进了瓮里；英国谚语说：“发明断头台的，头一个试用它”（*He that invented the maiden first hanged himself*），只是英国人称断头台为“少女”（*maiden*）。那东西的发明者是法国医生吉约坦（*Joseph Ignace Guillotin*, 1738-1814），原是想减轻犯人被梟首时的痛苦。谁知吉约坦这个名字竟成了法国人对断头台的称呼，遂使其子女敦请改之。改是改了，只是改的不是断头台的“吉约坦”之名，而是他后人的姓。自作自受。

我们的谚语说：“纸里包不住火”；法国人说：“吃了国王的鹅，二十年后也会拉出鹅毛来”（*Qui mange de l'oye du Roy chiera une plume quarante ans après*）。

我们的谚语说：“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”；英国人说：“宁为自耕农之首，不为乡绅之末”（*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*），这句若直译成“宁为狗头，不为狮尾”，就更接近我们的土产“宁为鸡头，不为凤尾”了。

^① “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”见《旧约·传道书》第1章第9节。

我们的谚语说：“同行是冤家”；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（Hesiod，公元前859—公元前824）在他的教谕诗《工作与时日》（Works and Days）里说：“陶工与陶工是对头”（The potter is hostile to the potter）。

我们的诗人李白说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；英国的诗人赫里克（Robert Herrick，1591—1674）说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（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, Old time is still a-flying: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, Tomorrow will be dying.）（《致少女》，Counsel to Girls）。一样的提倡及时行乐。

当今，国人谈婚姻感受时常说：“鞋子合不合脚，只有脚知道。”无独有偶：想当初，古罗马名将鲍鲁斯^①决定与妻子离婚，却提不出任何理由。对妻子的娘家人，他先承认了妻子的种种长处，然后请他们看他脚上的鞋子。那鞋做工精良，实在看不出什么毛病，但鲍鲁斯对他们喊道：“你们没人知道鞋哪里夹脚！”（None of you know where the shoe pinches!）这话或许是他听来的，或者干脆就是他的发明。它居然能从当今我国恐婚族口中说出，这不能不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。

世俗智慧的格言警句先于书籍出现，其来源有三：古代，外国和民间。说到民间，除了田夫野老，贩妇走卒，贵族和文人也功不可没。百姓使之口耳相传，贵族和文人则撰写之，搜集之，汇编之。格拉西安这本《世俗生活智慧》有一英文版，其封面上赫赫然印着“一切自我修养书籍之祖”（The ancestor of all self-improvement books）的字样，真是井蛙之见。

① 鲍鲁斯（Lucius Aemilius Paullus Macedonicus，公元前229?—公元前160）：古罗马统帅，曾任最高市政官，执政官，打败并俘虏了马其顿国王珀尔苏斯（Perseus），还将马其顿和伊庇鲁斯（Epirus）两个王国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。



我国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庄子的《南华经》，都是春秋时代（公元前 770—前 476 年）的产物，从天道的高度统摄了处世之术。还有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、冯梦龙的《智囊》、陈继儒的《小窗幽记》、吕坤的《呻吟语》、洪自诚的《菜根谭》、张潮的《幽梦影》，直到李宗吾的《厚黑学》及宣永光的《妄谈·疯话》，皆为处世智慧的渊藪，西方人不能望其项背。

西方人打造世俗智慧文字的传统也很悠久。据柏拉图记载，古希腊哲人把格言警句归功于阿波罗，把各自的黄金箴言写进了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。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（Erasmus, 1466—1536）写了《愚人颂》，也搜集了一本《箴言集》（Adagia），含五千多条，为众人所爱，也为后人效法。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也是搜集、创造和使用格言警句的巧匠。马基雅维里有《君主论》；培根有《论说文集》，也集录过一本古代箴言；拉罗什福科（La Rochefoucauld, 1613—1680）有《道德箴言录》（Maximes morales）；托尔斯泰有《每日智者箴言》，这几位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公爵伯爵，无怪英国现代诗人奥登（W.H. Auden, 1907—1973）说：“从本质上说，格言警句是贵族的文学样式，它蕴涵着一种信念：其作者比读者聪明。”

其实，学者文人比贵族还聪明，如王尔德的机智妙语，叔本华的人生箴言，以及美国鬼才皮尔斯（Ambrose Bierce, 1842—1914）的恨世冷嘲。加拿大当代作家劳伦斯·彼得（Laurence J. Peter, 1919—1988）也能跻身智者，其“不胜任原理”，即“在层级组织中，每个雇员总想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”（In a hierarchy every employee tends to rise to his level of incompetence），实在是警世明言，这实际上是说在职的都



不称职，称职的无不想往上爬。想必大多数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若把它换成我们的说法“人往高处走”，听上去就不那么刺耳了。真话往往让人难以消受。鲁迅先生就说过，科学的真话放到艺术里便不成话，还写了一句“野菊性官下，鸣蛩悬其肘”的好诗（见《准风月谈·新秋杂识三》）。中药里的血余炭，其实是头发灰，紫河车其实是胎盘。有的时候，讽世的格言警句会因太真实而叫人胆寒。

二、格拉西安的处世智慧

格拉西安这本《世俗生活的智慧》颇负盛名，据说有八种欧洲语言的译本，其英文译本有11种之多，其中文译本至少也已有两种。这本警句集是格拉西安为世人总结的处世要言，不可不读。其存在当然有其合理性。但也用得着一句古训：书不可不信，亦不可全信。处世格言大行其市，固然反映了人无分男女长幼，是何身份，都力图趋利避害，越活越自在，但也说明了它的无用与不灵。处世格言犹如护肤品，唯其不灵，才畅行不衰。护肤品若一抹就灵，“资生堂”和“旁氏”等厂家岂不早就关了张？同样，人人若都按处世格言行事，人间岂不早就和谐了？或者说，人间岂不早就大乱了？

说处世格言不灵，主要有三个原因。其一，处世有道，其术无形。古哲老子有言：“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”看家的绝招，哪个传人？就连治国之术，他老人家也只说像熬小鱼儿，不能瞎翻腾（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）。他的名言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和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，听起来玄机四伏。精明者往往行而不言，言而不行。由此可见，所谓“秘笈”、“宝典”、“揭秘”的说法都是骗人的。仅此一点，就足以使“成功秘笈”之类的读物变得一文不值。何况写出来的也不一定



是天机，或许为一孔之见，是盲人摸象之言，因为此人之补品可能是彼人之毒药。

清朝才子纪晓兰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讲了一则寓言，说一人与狐狸交友，欲狐友现身，狐友却万变其形，就是不肯以真面示人，说：“天下之大，孰肯以真形示人者，而欲我独示其形乎？”大笑而去。岂止真人不肯露相，连真狐都不肯。据说有位铁画大师，一直到咽气前，才向一心侍奉他的徒弟透露了做铁画的绝招：“切莫用手拿热铁。”真是老到，死都不肯泄密。将处世“天机”写出来，供凡人揣摩吟味，这是违反天条，类似普罗米修斯之盗火。果不其然：据著名杂志《旁观者》(1712年)载¹，西班牙的阿兰达公爵夫人(Countess of Aranda)对格拉西安很是恼火，指责他“把这些警句公开给了普通的读者，而它们本应是留给伟人的知识。”

其二，世俗智慧既是社会的潜规则，那么，你既可以照它行事，也可以不理这一套，我行我素，无人能制裁你。这类规则并不具备对行为的强制约束力，破坏它并不违法。例如达尔·卡耐基要你“做个好听者，鼓励别人讲他们自己”(《怎样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》，第二部分“讨人喜欢的六个办法”之五)，你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事事要做焦点人物，处处哗众取宠，名之为顺应“注意力经济”，那也不犯法，至多是令人侧目而已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《利维坦》中说，文明社会的自然法(Lex Naturalis)既要求人们兑现承诺，也要求人们不可总是兑现承诺，因为若只有个别人遵守承诺的道

¹ 《旁观者》(Spectator)：英国18世纪初的一份杂志，反映中产阶级的人生趣味，1711年由英国诗人、散文家爱迪生(Joseph Addison, 1672-1719)和爱尔兰散文家斯蒂尔(Sir Richard Steele, 1672-1729)创办。



德法则，他们便可能成为不守道德者的牺牲品。^①在社会生活中，人们虽然感到必须制定游戏规则，却大多都不愿遵守，因为若只有个别人遵守游戏规则，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不守规则者的牺牲品，被当作傻瓜，大吃其亏。何况，你既可以对这类潜规则不以为然，更可以针锋相对，因为它们有时会就同一个问题给你截然相反的指导。例如我们的格言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，其对应西谚是“吱嘎响的车轮得润滑油”（**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**），这是要你善于向上级提要求，要你利用别人的恻隐之心；而与它对立的谚语是“出头的钉子挨锤子”（**The nail that sticks up gets nailed down**），相当于我们的“枪打出头鸟”，却要你谨言慎行，莫当领头发难的和诉苦的，以免遭“定点清除”之祸。何去何从，选择在你，后果自负，祸福自取。

其三，历史表明，深谙处世之道者有时也会自取其祸，下场不佳，正所谓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”。阔论处世之道者往往是纸上谈兵，连自己都难保。格拉西安本人就是一例。我国古人韩非和刘基也是如此。韩非智力过人，文才更非等闲，其《说难》一口气列出了七条“如此者身危”，还告诫说莫跟君王对着干；万不可哪壶不开提哪壶（“无婴人主之逆鳞”），可谓圆滑世故，可他自己却仍难逃被同学李斯毒死的下场，引得司马迁为他扼腕：“余独悲韩非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耳。”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一，属于神仙级

① 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, 1588-1679）：英国哲学家，其著作《利维坦》（*Leviathan*）发表于1651年，论述国家政体和人性，其中说：“自然法约定人们兑现承诺，但又约定人们不在任何情况下都兑现承诺。这是因为，若别人都不守承诺，守信的履约者就会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牺牲品，必使自身毁灭，这与全部自然法的基础相对立，因为自然法维护生物的保全。”（见第十四章“论第一、第二自然法和契约”，本文作者根据原著翻译。）



的谋略家，有治国术名作《郁离子》和预言名篇《烧饼歌》传世，但最终还是争权失势，忧愤而终。

再说外国名人，马基雅维里是何等工于心计，官拜大使，培根更是精明老练，官拜内阁掌玺大臣和大法官。马基雅维里失势后，原想凭《君主论》讨得佛罗伦萨公国的官职，却因此书名声太臭（因其中说毒杀政敌、作伪证和雇用刺客都是合法的政治手段），遂被当作了阴谋家，未能如愿，抱病而亡。这还不算，他的名字已被当成了“不择手段的阴谋家”的同义语，据说直到近些年来其人格才得正名。培根告诫人们“私人请托确实有损公益”，受托者“事成之后不可索要额外报酬”（“论请托者”），自己却于1621年以28条贪赃枉法罪入狱，还曾被关进了伦敦塔；他说“只顾荣华、不顾人格者可算十足的奴才”^①，自己却卖友求荣，无怪美国《时代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他该下但丁《神曲》中的第九层地狱，那是卖友者聚会的地方。大学问家栽了大跟头，如今也不乏其例。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哲学博士，著有大作《愚蠢论》和《愚蠢史》，洋洋数十万言，恍若双子座，自己却上了网络警察的大当，因引诱少女而锒铛入狱^②。可见知识不等于智慧，学问大不一定智慧多。

世俗智慧不同于超世俗智慧。超世俗智慧是如何感悟人生价值，如何使心灵安详以及如何达到极乐的彼岸。参悟了超世俗智慧，能“照见五蕴皆空”，能“度一切苦厄”（《般若

① 见《培根论说文集》（水天同译，商务印书馆）的绪论，其作者为斯威顿（Oliphant Sweeton），文中说此话出自培根《散文集》1607年版的“论友谊”。

② 此人名叫詹姆斯·威利斯（James F. Welles），其《愚蠢论》（Understanding Stupidity）于1987年出版，他2002年11月被捕，年方61岁，罪名是在网上聊天室对一名15岁女孩进行性引诱。那女孩是40岁的警探托德·杜耶尔（Todd Dwyer）假扮的。这哲学博士在网上跟那位“未成年人”聊了三个星期后，在约见的饭店里被捉。



波罗蜜多心经》)。世俗智慧则是懂得如何知世人、识世道，如何与人周旋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谨慎做人，圆滑处事。格拉西安的这些警句属于世俗智慧，其核心是审慎，是明哲保身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“善争不如善躲”。它们的英译者指出，它们是写给已无衣食之忧者的。确切地说，它们大多是写给官场或准官场人士的。其内容既有高尚，也不乏鄙俗。精练的语句，巧妙的措辞，不能遮蔽作者居高临下、自以为是语调。格拉西安是耶稣会的布道士和经卷教头。在西方，“耶稣会修士”常是“伪善者”和“阴谋家”的代名词。耶稣会（*Societas Jesu*）1534年成立于西班牙，是罗马天主教會的顽固派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，其历史很不光彩。它主张介入世俗生活，将教义与世俗智慧结合起来，以布道、办学、充当王公贵族的忏悔神甫等方式渗入社会和宫廷，做教皇鹰犬。格拉西安曾请求退出耶稣会，未能遂愿。我们不因人废言，但应当对它们有所鉴别，更应看到其中一些说法并不光明正大，甚至堪称狡诈，例如：

“要找出每个人的把柄”（26），这是弄权者言，心地阴暗。

“切莫与会使你相形失色者为伴”（152），这是世故者言，自作聪明。

“相信今天的朋友，但要将他们看作明天的敌人，并且是死敌”（217），这是阴谋家之言，害人害己。

“助人往往代价不高，却大有收益，你用言辞即可买到功绩”（226），这是奸商之言，助人以求报，恶莫大焉。

手段的卑鄙有时表明目的的卑鄙。言为心声，在格拉西安的警句里，我们看到了圣徒与小人的混合。其中有英雄之言、智者之言和圣徒之言，也有枭雄之言、奸佞之言和市侩之言。不仅如此，这些警句体现的价值观也值得怀疑。



格拉西安常使用“智者”和“蠢人”的对比，这不仅是价值判断，而且是道德判断。英译者说格拉西安“既有睿智的世俗，又有世俗的睿智”，这其实是说他并不轻视尘世的“幸福”，也不鄙薄做人的“成功”。老子有言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智慧出，有大伪。”格拉西安则最推崇“智者”，在他的语汇里，智者的审慎与精明，其实很难区别于权谋家的狡猾，例如：“智者懂得：审慎的唯一指导原则是看风使舵”（见警句288）。他最蔑视“蠢人”，说“蠢人是危险的伙伴，毁人的知己……他们最不走运，这是对愚蠢的报应，他们不得不为蠢事付出代价”（见警句197）。

以成败论英雄，以智愚论人品，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。处世术之所以绵延不绝，是因为没人愿做失败者，没人愿做愚人。世上有三种人：理想主义者、浪漫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。追求理想者可敬，追求感情者可爱，追求实利者既不可敬又不可爱。理想主义者是英雄，有的甚至是以生命去殉理想的烈士；浪漫主义者是讨人喜欢的伙伴，但下了舞台便一无所长；实用主义者面目可憎，却屡屡得计，并将前两种人视为蠢人。

在当今商业社会的舞台上，理想主义被视为迂腐，浪漫主义也谢幕了，惟有实用主义在唱主角，正像某炒股软件的广告词：“挣钱是硬道理”。实用主义者蔑视另外两种人，将高尚理想和高雅情操看作不中用的摆设。在他们看来，“忠厚是无用的别名”，说人“忠厚”是骂人；不精明便不能成功，不精明就要挨打。他们总嫌自己不够精明，甚至可以不择手段，寡廉鲜耻，损人利己，不守游戏规则（“只要达到了目的就毫无损失。好结局能给一切镀金，无论手段多么不得人心。因此，你若无法取得好结局，那就去犯规，有时这是人生艺



术的一部分”，见警句 66），不讲道德底线，以攫取“第一桶金”，先取得“成功”，再扮作圣徒。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发迹史讳莫如深。与他们的成功观相应的是其英雄观。帝王是他们心中的英雄。他们把帝王看作天之骄子，受命于天，是“群氓”的当然主宰。私利文化中的富豪也是他们心中的英雄。他们把富豪看作智者、社会精英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。美国有个乔治·吉尔德（George Gilder, 1939-），恬为未来学家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财富与贫穷》（*Wealth and Poverty*, 1981），其中声称：富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富；他们富是因为他们杰出；富人杰出，是因为他们“能生产财富”，而普通民众只是财富的消耗者；“物质进步是艰难的。它要求其参与者长期的勤奋、牺牲、全力投入和甘冒风险，而只有获得高额回报，而不是仅仅获得‘资本的平均回报’，才能成为精英”；全世界都要依靠这些竭力获取资本最高回报的超人（《财富与贫穷》，第 304-305 页）。这完全是帮闲加走狗的论调。

这样的价值观念加上格拉西安的处世智慧能否造就成功者，谁也不知道，但可以确定一点：它一定造就不了圣徒，一定造就不了和谐社会。和谐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靠的不是私利文化的心机与智谋，而是公益文化的善良与真诚。这些警句的英译者雅各布斯仿佛也看到了它们的无用，他指出：格拉西安似乎在坦言生活的游戏毕竟过于复杂，任何规则都没有多大用处。

看到这里，成熟的读者大可不必失望，更不必到书店退书，因为老子早就讲过无用之用。公开了的秘诀已无用，也就有了用。不用就是用。何况有用无用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。至少它还有文化价值和认识价值。当你有幸成了弱势群体一员时，可以对照它想想自己为何成不了“精英”。当你不幸想



成为“成功者”时，可以对照它掂掂自己的手段和斤两。

三、关于这个中译本

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使人们建造通天塔的愿望落了空¹。他使造塔人失了业，却使通译者有了饭吃，可见翻译一行乃上帝所赐。了解原著，最可靠的办法当然是直接去读原文，条件是你不但要精通作者的语言，且要通晓原作的文化。大多数人太忙，没时间学外语；大多数人太娇，吃不了钻研外语之苦，而情愿相信“速成”；大多数人太善，不忍把世上古今所有的外语统统学会，以饿死译者。译者自古有之，《周礼·秋官司寇》里叫他们“象胥”，但人们对译者很不厚道，其最甚者，谓之“译者，叛者也”（Traduttori traditori）；对译品更欠厚道，如称之为“披狮皮的驴”、“煮熟的草莓”以及“搀水的酒”等等。不过，叔本华说翻译是“用一种乐器演奏原为另一种乐器写的曲调”，此话却不假，因为他就是优秀的译者，也译过格拉西安的这本《世俗生活的智慧》。

这个中文译本涉及两个问题：一是转译，二是复译。所谓转译，指的是根据原文另一种语言的译本翻译；所谓复译，指的是对同一作品的再译。

转译一向被人鄙薄，因为它是原作影子的影子。鄙薄者可分两种，一种是虽通原作语言、却不屑于或没本事将它译给国人看的西崽，一种是迷信原装货的读者。

关于前一种情况，鲁迅早就有言：“自然，中国未必没有

¹ 参见《旧约·创世记》第11章第1-9节。其中的“巴别”（Babel）在希伯来语中意为“混乱”。此字在英语《福音圣经》（Good News Bible）里已改作“巴比伦”（Babylon），但在中文《圣经》（神版）中仍是“巴别”。

